

龙与鹰：

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梁碧莹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龙与鹰：

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梁碧莹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梁碧莹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0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7-218-04581-2

I. 龙… II. 梁…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②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784~1949 IV. ①K250.7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355 号

责任编辑	崔肇钰 倪腊松
封面设计	张力平
版式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3.75
插 页	1
字 数	402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581-2/K·926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80517 020-83794727)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朱小丹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张小杰

苏立功 陈海烈 金炳亮 黄尚立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前 言

中美关系发端于世界发生剧变的 18 世纪下半叶。1784 年，美国正式脱离英国独立的第二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广州口岸，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就世界大气候而言，以英国产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中美关系是在这一大潮流中开始的。

就美国而言，刚摆脱英国殖民枷锁成为独立的国家，没有封建主义的包袱这一特色又使美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工业文明来得比较晚，美国产业革命在 1812—1814 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后才开始，即使在那时，工业文明并未立即占有明显优势。重要的是，处在大西洋一隅的美国，建国伊始，百业待兴，在政治独立同时，必须开创一条经济独立之路，与中国通航正是经济独立自主的举措之一。

就中国而言，中国正处在康雍乾盛世时期，出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统一的局面。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统治从 1662 年至 1795 年，长达 134 年。中美关系建立之初，清政府的盛世期虽则已近尾声，但还剩其余威。当时，中

国有其独特的对外贸易方式，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是中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当第一批美国人来到广州口岸时，这座内外闻名的贸易名城，正忙碌地接待从四面八方来的各国商人，古黄埔港上帆樯如林，呈现一片繁荣的贸易景象，美国只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客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了早期中美关系的鲜明特点：（1）美国与中国交往是以两个独立国家平等互惠为起点的，因此，在中美交往的最初几十年，大体在19世纪30年代前，两国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虽然中国人对这些酷似英国人的花旗国新人一时难以辨别清楚，一旦识别后，观其言行，感到他们能循规蹈矩，中国官方还给予“最为恭顺”的定论。美国人虽然感到与中国贸易的圈子太小，与中国贸易极为简单，但也推崇中国商人的诚实和比别的地区商人高一筹的商业道德。（2）在中美贸易交往中，美国更显得热切和主动，对纽约与广州通航的成功，美国的欢欣程度大大超过中国就是一明证。“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报纸纷纷报道这一历史事件，并称之为“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却缺乏这份热情，广东商人以平静的心态迎接远方的新客，甚至权威的《粤海关志》竟然误把中美通航时间说成是乾隆五十二年，即1787年，后来才加以纠正。（3）美国对华贸易以其独特的“美国方式”进行：通过加快船的速度，以赢得时间；辗转贩运各国货物，以扩大利润；发掘人参等本土产品，以发展其贸易优势。同时，美国商人深知，他们既无与东方打交道的经验，又缺乏资金，为了使商务顺利开展，美国商人努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均促使这个后来的国家以较快的速度跃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欧美国家与中国毕竟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前者处在资本主义的青春期，而后者却步入封建主义的垂暮期。不

同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不同的前途。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所说：“18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①

当历史跨进1840—1949年这110年时，中美关系的情况就与上述完全不同了。两国关系已发展为不平等关系，即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当历史步入19世纪，古老的中国送走了它最后的一个兴盛期——康雍乾盛世，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迎来的是西方列强侵略的暴风骤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步步进入中国，用不平等条约获取了政治、经济、军事的种种特权，其后果是中国的领土主权的丧失，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获得在华的贸易特权、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指出，美国建国初期，其“侵略、扩张、征服还只是一种‘势’，尚有待演化为‘力’”。直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和太平洋亚洲关系中侵略、扩张的‘势’也终于演化为‘力’”。^②这100多年的中美关系史，主要是美国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关系，也有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人民在关键时刻对中国人民的支持，还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两国成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盟友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美国对华外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① 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语冰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② 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角，而美国却追随着英国的炮舰外交，利用最惠国条款扩大在华利益和特权。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是如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蒲安臣的“合作政策”更具体体现美国联合英、法、俄等列强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一致的步调，共同维护和扩大列强在华特权。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始终是美国商人朝思暮想的广阔市场，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的一贯目标是开拓中国的市场，追求经济特权和利益。于是，在1899年和1900年，美国先后两次发出照会，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的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体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独立姿态。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以往对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不是对美国以往对华政策的改变或否定，正好相反，“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是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的应用和发展，但不是简单的重述。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在列强争夺在华权益中，利用最惠国待遇“分杯羹”。不同的是，当美国“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时，“合作政策”的用意是防止其他列强排斥美国在华利益；而当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工业巨头后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也同样为了扩大美国在华利益，但已充分反映了美国欲在远东政治舞台上争夺领导地位，为美国在远东的霸业开辟道路的意图。

中美关系的发展总是受到第三国因素的制约。诸如19世纪时的英国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因素，都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本书中《美国与鸦片战争》、《蒲安臣与“合作政策”》两节涉及到中美关系中的英国因素；《“门户开放”与“特殊利益”》涉及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杜鲁门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涉及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

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还有中美关系史上沉甸甸的一页，这就是华工走向美国的历史。19世纪中期美国的淘金热把珠江三角洲的中国人卷了进去，大批华人走向新大陆，他们在异地里开拓奋斗，在开发美国西部和修筑横贯美国大铁路中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在排斥的土壤中，以惊人的忍耐和毅力，在绝境中奋争，终于成为美国少数民族中无法忽视的一支。华人和美国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了今日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赢得了美国人民的赞誉，历届总统对美籍华人的评价可以佐证。1981年中国春节时，美国总统里根在《中国新年贺词》一文中说：“华裔美国人应该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他们的先辈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①但是，美国华人的历史是一段充满文化冲突、政治排斥的不平等的历史。在种族歧视的驱使下，美国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排华恶浪，从西部推到全国，从地方推到首都。美国实行的一整套排斥华人的制度，对华人在美国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障碍。这段历史不能忘记，“无须遮掩，也不必粉饰”。在种族偏见和歧视继续存在的今天，研究这一段历史仍然很有必要。

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专著之多为人瞩目。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某些史事的探索参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力图把重点放在有特色的问题上。

首先，重在探索广州地区的中美关系。广州是中美关系的肇始地，又是最早通向世界的门户，在广州寻觅中美关系的足迹大有必要，通过研究和寻觅，从中亦可发现中美关系中的几个“第一”。诸如：广州是美国第一艘商船到达的口岸；广州是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涉足的地方；广州是

^①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里根总统文选》), 1981, Washington, 1982, p. 71.

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由美国人操办的西医院出现的地方；广州是中国人最早看美国、美国人最早看中国的重要窗口等等。本书的几章均记载发生在广州的中美关系史事。

人物研究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本书也极为关注与中美关系史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美国方面有：美国商人、首届驻广州领事山茂召，第一个登上广州口岸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中国方面有：近代中国第一批放眼世界之士徐继畲，驻美公使伍廷芳，世界性伟人孙中山等。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了史料，也要加以整理和分析，不能仓促作出结论，主观臆断更不足取。我们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深感时人评论历史既具真实性和可信性，又带有时代感。利用那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去评论某一史事，使后来的研究者更能走近历史、了解历史事件的真貌，使逝去的历史过程跃然在眼前。本书的一些章节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历史考察。如，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商界也派员参加，并记下这一盛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节就是利用时人的记录介绍中国人在美国的经济活动。又如，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美国为首的列强，重拾“门户开放”原则，并把它作为国际协定加以法律化。中国代表在会上公开申明中国承认列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舆论对“门户开放”政策也议论纷纷。《华盛顿会议与“门户开放”》一节利用当时的材料再现这一过程。

把任何一个历史领域的研究置在整个历史研究的汪洋大海中，它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但将其研究清楚，揭开历史的谜底，对于今人了解过去、启导未来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广州口岸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	1
一、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	1
二、山茂召与《山茂召日记》	25
第二章 中国茶文化走向美国	47
一、中国茶传入美国的历程	47
二、茶叶贸易与早期中美关系	64
第三章 鹰与龙的第一印象	86
一、早期美国商人视野里的中国	86
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的美国观	112
三、徐继畲看美国	142
第四章 美国传教士与中美关系	157
一、广州口岸第一批美国新教传教士	157

二、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态度的演变	181
三、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196
第五章 华工与侨务	218
一、华人走向美国的足迹	218
二、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	232
三、伍廷芳与中美侨务交涉	247
第六章 中国与美国博览会	266
一、费城万国赛会	266
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283
第七章 19 世纪美国对华外交	307
一、美国与鸦片战争	307
二、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329
第八章 “门户开放”原则的应用	344
一、“门户开放”与“特殊利益”	344
二、华盛顿会议与“门户开放”	366
三、杜鲁门主义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386
第九章 孙中山与中美关系	411
一、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	411
二、孙中山从联美到联俄	438
三、孙中山晚年的美国观	458
四、孙中山与美国记者	473
附录一 英汉姓名译名对照表	500
附录二 参考书目举要	509
后记	526

第一章

广州口岸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

一、美国对华贸易的缘起

美国独立的第二年，美国商人迫不及待地开辟了纽约至广州的航路，其寻找对外贸易出路以解决经济上困境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和急切。当第一批美国商人来到广州口岸时，这座古今长盛、内外闻名的贸易名城，正忙碌地接待从四面八方来的各国商人，古黄埔港上帆樯如林，呈现一片繁荣的贸易景象。美国对华贸易是在如此反差的情况下开始的。

美国建国初期的广州口岸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正式组成一个国家。这个新诞生的共和国，在欢庆其胜利的同时，又不能不面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困境。

美国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战争造成的创伤。经过8年与英国的苦战，独立了的美国毕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期间，为了支付军费，大陆会议和各州都印发了大量大

陆券，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广大人民群众处于贫困境地。战争年代成立的邦联政府仅仅是一个具有州际联盟性质的政府，根据《邦联条例》规定，各州仍拥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邦联政府无权干预各州的经济活动。这样一个松散、软弱的政府，面对着战后纠缠不清的困境，几乎束手无策，十分迫切地寻找出路。

第二个困境是英国的封锁。在战争中被挫败的英国对美国进行了报复，既抬高美国运往英国货物的关税，又严禁美国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西印度群岛，扼杀了美国人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堵塞了美国商人们的财路。原属美国盟国的西班牙也于1784年封锁了密西西比河口，严禁美国船只通行，造成对美国的威胁。^①曾与美国并肩作战过的法国在战后只勉强地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海港，允许载货量60吨以下的美国船只出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初生的美国，“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②。

于是，美国在与周边国家寻求贸易出路时，也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与中国的通航上。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因为美国具有向海外发展贸易的可能性。长期以来，西印度的贸易、渔业以及与葡萄牙和地中海各地的通商，曾经是北美殖民地的重要生活来源。北美造船业比较发达。美国有着犬牙交错的海岸和河流，加上丛林密布，盛产造船所需要的橡木和松木，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大有利于北美造船业的发展。波士顿成了当时造船业的中心。177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建造的船只每年介于300~400艘之间，

^① S. F.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New York, 1938, p. 34.

^② Agnes D. Hewes, *Two Oceans to Canton: The Stor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休斯：《两洋通广州：早期中国贸易史》，New York, 1944, pp. 10-11.

1774年，船舶载货总吨数已达21万吨。英国船约有1/3是北美殖民地建造的。^①独立战争中，美国政府为对抗英国海军封锁，准许美国人持“私掠许可证”在海上劫掠敌船，许多海上冒险家因此致富。独立战争后，沿海的造船业更为发达。海上贸易的发展吸引着许多美国人对远航的兴趣，不少人还未到成年就随船出洋。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航海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富有冒险精神的航海人员和商人。

美国要开通与中国的航线也不是没有条件。美国对古老的中国也不算很陌生。还在独立前，中国与北美洲之间虽然没有直接航线，但是，北美人民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走私而来的茶叶、辗转运来的丝绸和棉布间接了解亚洲、了解中国。1771年，费城的一份杂志介绍北美农业已成功地引进了中国的稻米、高粱和豌豆。该文还预言：“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②

独立前，北美的居民已听说过有关广州口岸贸易的传说。美国人雷雅德曾参加过赴太平洋的远航。1782年他返美时告诉其乡亲父老，在美洲西北海岸以6便士买的一张毛皮在广州居然可以卖100美元；中国茶叶、生丝出口价格便宜，给贸易商人带来巨大好处。他竭力鼓吹美国人对华贸易，以毛皮去换取中国的茶和丝。虽然雷雅德的话有点离奇，后来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甚至认为雷雅德“是一个机敏而有学识的人，但不幸的是幻想太多”^③，但一

① 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 1492—1823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② Jonathan Goldstein, *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682—1846* (乔纳森·戈尔茨坦：《费城和中国贸易 1682—1846》)，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9-20.

③ P. L. For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福特：《杰弗逊文集》)，vol. 4, p. 447.

个个远航中国的计划早在筹划中。1783年11月，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罗伯特·莫里斯写信给美国邦联政府外交部长约翰·杰伊说：“我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①12月18日，大陆会议收到了两位公民菲力浦·摩尔和约瑟夫·沃德的信，请求批准保护他们的船只驶往中国。摩尔还提出任命驻华领事的建议。^②

正当美国人热切寻求通往广州的航路时，广州已是中國最大、最主要和最繁荣的商港，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广州是世界闻名的港口城市，其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已是我国的主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明清时期政府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次年宣布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在四处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了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三处通商口岸，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粤海关也成为我国唯一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种情况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

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所有来华贸易的外国人被严格地限制在三个地方：澳门、黄埔和广州城外商馆区。澳门是所有外国船来华的第一站，是通往广州的第一道关口，每一艘外国船都必须在那里领取前往黄埔的

① H. P. Johnston,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约翰斯顿编：《约翰·杰伊书信演说集》)，New York and London, 1891, vol. 3, p. 97.

② 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证件。澳门“为夷人聚集重地”^①，在贸易季节以外，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撤离广州在澳门居留。离广州 12 英里的黄埔港被指定为外国船的停泊所。广州城外商馆区是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场所，外国人在广州居住期不得超过 4 个月，一切商务办妥后必须离开，前往澳门。于是，澳门、黄埔和广州城外商馆区就成为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地区。

据《粤海关志》记载：古黄埔港的旧址“在广州府番禺县距大关三十里”^②，即今天广州市海珠区的黄埔村，当年粤海关黄埔挂号口便设在这里。那里有税馆、夷务馆和买办馆。黄埔村昔日称“风浦”，由于外商经常出入，外国船员将“风浦”讹读为“黄埔”，久而久之，“黄埔”也因而成名。古黄埔港是各国船进口出口货物的集中地。在贸易旺季，停留在这里的外国水手为数达二三千人。许多人都住在黄埔的船上，只能分小批前往广州。一位美国商人曾记载黄埔岛上贸易的繁荣景象，他写道：黄埔岛“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③。在贸易季节时，黄埔港上帆樯林立，舟楫如梭。

就中美双方贸易背景而言，美国人漂洋过海开辟通往中国的航路，表现其对华贸易的主动性。虽然为寻求经济独立和发展，中国并不是美国人唯一的视点，正如美国人自己所说，他们“不得不到东方寻找出路，甚至任何地方也不得不去”，但这又表现出其对华贸易的热切性。中国的情况却不同。这时期的中国还处在中国古代史上所称的

① 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粤东省城龙藏街业文堂承刊，（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5 年版，卷 7，第 5 页。

② 梁廷枏等纂：《粤海关志》，粤东省城龙藏街业文堂承刊，（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5 年版，卷 5，第 16~18 页。

③ [美] 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 页。